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海德格尔的弟子

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

Heidegger's Children

Richard Wolin

[美]理查德·沃林 著 张国清 王大林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B516.54

5

西方文库·思想译丛

海德格尔的弟子

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

Heidegger's Children

[美]理查德·沃林 著 张国清 王大林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的弟子/(美)沃林著;张国清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1

ISBN 7-5343-6888-X

I. 海...

II. ①沃... ②张...

III. 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209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海德格尔的弟子

作 者 [美]理查德·沃林

译 者 张国清 王大林

责任编辑 曹 军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368546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插页 2

字 数 235 00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24.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代译者序

距离产生力量

——理查德·沃林访谈录^①

张国清

沃林:在现在的法国,有一股社会思潮,一股崇拜毛泽东的社会思潮,正在悄然兴起。法国是一个充满艺术的国度,也是一个不断萌生新思想的国度。1989年以后,随着苏联和欧洲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法国年轻一代既对原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但是也没有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有任何好转的希望。于是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东方,投向了中国,投向了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思想非常推崇,把它当做用来解决当代西方社会问题尤其是法国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

张国清:我来巴黎之前就已从媒体上有所耳闻,现在法国有一股极“右”的排外思潮,在这一次法国大选中勒庞(Le Pen)的意外崛起让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为之震惊。难道与这股极“右”势力相对应的有一股

^① 2002年4月24日下午,借到欧洲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如约在法国巴黎卢森堡公园附近的一所公寓中拜访了正在那里度假的理查德·沃林教授。这是那次访谈部分内容的记录。

极“左”思潮吗？他们推崇毛泽东的什么理论？

沃林：的确有一股“左”的思潮。他们推崇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法国年轻人正在准备一场新的革命。

张国清：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吗？

沃林：他们大多不了解。他们推崇的是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他们希望把它应用到法国社会实践中去。

张国清：中国人用“十年浩劫”和“民族灾难”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也许法国年轻一代不了解中国文化革命发生的真正背景和真相。

沃林：的确如此。一种思想被放置到一个新的语境中，便会产生新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现在，许多法国年轻学者就在做这一项思想移植的工作，他们试图让毛泽东主义在法国产生一种社会后果。但是在我看来，毛泽东的思想不适用于西方国家。

张国清：那要看一个社会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毛泽东思想对于解决中国新民主主义问题还是很管用的。但是，它不能用来解决非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革命思想，当一个社会根本的革命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建设的问题而不是继续革命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非革命的理论资源来处理那些社会问题。

沃林：但是法国的年轻一代不这么看。他们需要找到第三条道路。苏联共产主义已经行不通，欧美资本主义也没有希望。他们需要走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主义。

张国清：他们如何表述毛泽东主义？

沃林：继续进行革命，继续与资本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继续进行文化革命。

张国清：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而至于不可调和的程度，便有可能发生革命。但是革命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的教训。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革命的优秀成果。我们正在努力保留这个成果。

沃林:的确如此。现在我正在考虑的问题是革命之后的社会理想的传递问题。

张国清:我从历史中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大凡在革命之后,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其最重要的活动便是把革命成果以法律形式确立起来:英国革命之后,产生了宪政制度;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确立了全新的国家制度形式,这种国家制度形式也随之法律化了;法国大革命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其最大成果不是废除了封建制度,而是确立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它们成为以后整个社会运作的准则和基础。所以革命很重要,但是把革命的成果法律化和制度化比革命本身更加重要。

沃林:所以,衡量一次革命是不是成功不仅在于看革命者是不是夺取了政权,而且在于革命者是否成功地把革命的成果法律化和制度化。

张国清:以此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只能说它是一次对于中国革命的反动。因为它导致了一种虚无主义,它不是要保持革命的成果,而是要把革命的成果统统摧毁。文化革命并不试图去保存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而是把它们统统当做已经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的东西来予以消灭。这是一场单纯的毁灭活动,用后结构主义的话来说是一场“解构”活动。从内在的灵魂到外在的肉体都予以摧毁的运动。

沃林:所以,革命总是有限度的。革命总得要在一定的时候停顿下来。我反对不断革命论。因为这种理论的最终结果是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是非常可怕的,自我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自我毁灭。这是一种虚无主义,它利用了人们的热情,却没有一个理性的目标,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很危险。现在法国的一些年轻人就有这个倾向。他们想利用毛泽东主义来进行一次文化革命。

张国清:我对法国最近的思想界了解不多,也许你能够给我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沃林:当然可以。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关于法国思想界的最新走向的。我与这里的学者做过许多交流。待以后有机会时我可以给你这方面的材料。

张国清:我来之前从网络上看到你在你的新著《海德格尔的弟子》出版之后与读书界的一次直接的网上访谈活动。你的著作在世界范围里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沃林:这本新著已经被译成多种语言。在这本书中,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所产生的“非哲学的”后果,这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德格尔研究者尤其是他的弟子来完成的。我们应该承认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不要把两件事情混同起来。其一是海德格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其二是海德格尔曾经与纳粹同流合污。我们不应该以后者来否认前者,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在海德格尔研究者中间有一股为后者做辩护的倾向。

张国清:你在《存在的政治》、《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争论集》、《迷宫》和最近的《海德格尔的弟子》中都谈到了海德格尔和纳粹的关系问题。你对此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

沃林:我自己的主张一直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思想界疏远了海德格尔,他们对海德格尔的哲学和纳粹的关系有着一种清醒的自觉。后来,海德格尔哲学在传播过程中,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被给予了新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海德格尔的诸弟子,像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等人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这些人没有对海德格尔丑恶的一面做出深刻的反省。

张国清:你的意思是说,海德格尔的众弟子后来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海德格尔的政治污点的辩护人。

沃林:那倒不是。因为我注意到,海德格尔的这些弟子大多是犹太人,这一点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多是犹太人的情形相似。我发现,当社会面临巨变的时候,哲学家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当希特勒和纳粹上台时,海德格尔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是有一点仍然是重要的,那就是这个微弱的声音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上发出来的。有一种说法是说海德格尔是一个政治上的无知者。对此我并不这么看。希特勒或纳粹并没有真正重视过海德格尔哲学。在那个时代里,哲学和哲学家都处于边缘状态。但是,哲学家自己的个人言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不是因

为在实践上或行动上有多重要，而是他在思想上非常重要。

张国清：我在你的多部著作中读到了你对德国纳粹时期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卡尔·施密特的专门研讨。如你在《文化批评的观念》和《迷宫》中都以专章的篇幅来讨论卡尔·施密特。近几年，中国的思想界对卡尔·施密特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的一些著作已经在那里被陆续译介过去。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和你探讨一下卡尔·施密特这个人物。

沃林：卡尔·施密特和海德格尔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是一个纳粹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法学家。他直接参与了纳粹的许多立法活动。所以他是一个全心全意的纳粹分子。对于他的思想和行动，我在《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中多有揭露。如我说过：“卡尔·施密特是魏玛时代德国主要的法学理论家之一，他对希特勒独裁统治的全力支持成为伴其余生的一桩丑闻，直到1985年以96岁高龄去世。”

张国清：的确如此，卡尔·施密特和海德格尔对纳粹的关系表明了法学和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我称做“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与施密特相比，海德格尔（哲学）只能算是一种处于“边缘”的东西。现在在欧美的学术界有一种要把卡尔·施密特（法学思想）也予以“边缘化”的倾向，他们试图淡化施密特与纳粹的关系。并且这种倾向在中国也有一定的表现，这不是一个好的倾向，是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的倾向。

沃林：对于卡尔·施密特的法哲学思想，的确存在着一个重新解释的问题。我认为，像对待海德格尔一样，要区分两个事情。其一是卡尔·施密特的法学思想。其二是卡尔·施密特与纳粹的关系。在我看来，虽然卡尔·施密特的思想在欧美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其见解根本是错误的。

张国清：我前不久看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纳粹在德国和欧洲兴起的一些纪录片。当时的德国人确实对希特勒寄予了希望。虽然那是一股邪恶的力量，但是当时没有一股正义的力量能够将它战胜。从你刚才的谈话中，我似乎也感到像卡尔·施密特这样的法学家其实

并没有从合理性角度替纳粹和希特勒的独裁做辩护。当时的德国人已经对理性丧失了信仰。

沃林:把希望寄托于一个疯子,并且用一种理论来予以论证。这只有在在一个疯狂的时代才成为可能。施密特就是替那个疯子的合法性,替那个疯狂时代的合法性做论证的人物。

张国清: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后革命的时代”。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确实面临着一次重新给自己定位的问题。随着“革命”在世界范围里全面停顿下来,我们就要去思考“后革命的主要社会问题”。

沃林:无论怎样,像民主、自由、法治、政治上和宗教信仰上的宽容等等都是可贵的人类历史遗产,是我们应该予以保留的财富。

张国清:现在,纳粹的噩梦已经终结,但是,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弊病。人类似乎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能够今天做些什么呢?

沃林:继续保持对于真理的信仰。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有一个立场的问题,是站在哪一边讲话的问题。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把公正性放在第一位,他必须不是为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而是为整个社会,为人类服务的,他发出的是一种人类的声音,他体现的是人类的尊严和良知。所以,他必须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身份,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言论。

张国清:公共知识分子唯一的存在方式就是思想,他们是为思想活着的人,是为理想活着的人。他们和政府、国家、利益集团之间都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公共知识分子具有批判力的前提。

沃林:是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不仅产生美感,而且产生力量,批判的力量。

中文版作者序

理查德·沃林

对作者来说,再也没有比得知其著作已经产生始料未及的公共影响更令人欣喜了。张国清教授翻译的中文版《海德格尔的弟子》尤令本人欣喜不已。张教授曾经是拙著《文化批评的观念》的译者。三年前,我与他有幸在巴黎会面,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之夜。他再次欣然答应翻译拙著《海德格尔的弟子》,真让我大喜过望。本篇序言使我有机会向既是译者又是朋友的他表示感谢。

假如拙著有助于推进中西方迫切的思想交流和融合,它就算大功告成了。最近数十年里,中国正在快速推动“现代化”进程。而现代性的两面性曾经让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德国思想家困惑不已。也许,正确评价这些思想家的哲学有助于有教养的中国民众认清自身面临的现代性前景和挑战。

—

凡是想要评价海德格尔遗产的人都马上会遇到一个自相矛盾的论题。一方面,他无疑是 20 世纪最杰出、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研究海德格尔的二手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已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专著和数以千计的论文,许多论著公开美化了海德格尔。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 30

年代,海德格尔曾使其哲学效力于极权主义当局——国家社会主义,那是政治邪恶的真正体现。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位哲人从来没有放弃对纳粹的效忠。相反,他的思想仍然沉迷于一个错觉之中:假如有另一番情景,那么第三帝国本应达到史无前例的伟大水平。

海德格尔的辩护者往往设法使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合理化,替那些错误做辩解。他们认为,那些错误是个人失误,绝不至于影响其哲学的性质和品质。然而,在海德格尔案例中,把哲学和政治学如此轻描淡写地一分为二的做法似乎难以服人。我们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借助于显然来自其早期存在主义哲学的概念,海德格尔竭力从哲学上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效忠正当化。

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论题牵涉到以下事实:虽然海德格尔在政治上与邪恶的反犹太当局同流合污,但是他最成功的弟子绝大多数是犹太人。1933年前后同海德格尔决裂之后,许多犹太弟子继续通过自己努力成为重要的哲学家。他们是汉娜·阿伦特、卡尔·勒维特、汉斯·约纳斯、赫尔伯特·马尔库塞。他们都成功地在美国大学谋得了教席。20世纪50年代中期,勒维特回到德国。他在海德堡大学荣获杰出教席,在那里与汉斯-乔治·伽达默尔共事,后者是海德格尔的杰出思想传人之一(在下面我将讨论伽达默尔针对纳粹的模糊政治姿态)。

海德格尔的“弟子”中没有一个人曾经断绝这位大师对其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不过,鉴于导师涉足纳粹的深度和广度,他们都为他们的规范哲学经验深感忧虑。因此,在他们对那种影响和地位的回顾性评判中,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往往带有爱恨交加的深厚色彩。

海德格尔在欧洲和北美的影响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他拥有的身份,用一个特定德语表达式来说,是因为海德格尔是一位文明批评家(Zivilisationskritiker),一位检讨现代文明失败和衰微的批评家。这种“时代诊断”(Zeitdiagnose)或“哲学伤感故事”,是一种特殊的德语文体,一种由尼采完善的散文形式。尼采曾经明目张胆地宣称:他的著作是“一些暗杀尝试”,他不是“人”,而是“炸药”。但是在海德格尔时代,其登峰造极的实践者毫无疑问是斯宾格勒。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

落》(1918, 1922)对“战争一代”——包括海德格尔——产生了强有力的观念影响。因此,斯宾格勒的著作,尽管往往写得浮夸且是面向广大民众的,成功地肯定了一代人的偏见和忧虑,他们的规范经历是像哈米吉多顿战场那样的大混战。德国输掉了实际的战争,但是胜利的西方列强无法从以下事实得到点滴安慰:他们造就的文明正在遭受无法挽回的急剧衰败(Untergang)的阵痛。

海德格尔话语的鲜明特点在于他对西方现代性社会和技术急性病的谴责。这无疑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他的启示录式的言论打动了仍然被最近这场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搞得晕头转向的欧洲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纲领性文献《超越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使用了一套救世主式的花俏行话,哀叹“世界的崩溃”、“地球的荒芜”,感叹造物弄人:“劳动动物”——“人”——“被其产品搞得眼花缭乱,以至于自身碰得粉身碎骨,化为空洞的虚无”。^[1]海德格尔对这些发展的哲学回应通常陷入了神秘主义,比如他后来对“四重性”即“上帝和人、人世和天堂”的暗示就是如此。他的言论也在苦恼的人世间激起了深刻共鸣,欧洲民众相信所有的政治解决都将必败无疑。

因此,在冷战及其相伴的核武器竞赛期间,正如在其战后最有影响的论文“论技术问题”和其他论文中展开的那样,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很好地迎合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焦虑。同样,在北美,美国先进技术被用作毁灭性武器的越南战争使许多知识分子相信,只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的激进路径才拥有压倒一切的解释力量。于是,对其著作的翻译和注释工作日益增多起来。除了他捂着掖着的政治过去之外,海德格尔似乎仍然找到了一片称心如意的小天地,而把西方现代性技术过度视作“恶的良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源于德国右派的对理性、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批判最终赢得了政治左派代表的称赞。毕竟,在希特勒夺取权力之前的几年里,海德格尔已经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卡尔·施密特和恩斯特·云格尔等保守的革命派同流合污。在决定性的1933年,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纳粹革命的怀抱中。他曾经一本正经地

说道：“不要让学说和观念成为你的大在的法则。只有元首才是现在和未来的德国现实与法律。”^[2]

海德格尔的真正政治“复辟”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3]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战后对海德格尔的接受是极其脱离历史、脱离背景的，大多没有涉及其思想的意识形态含义。^[4]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他的哲学“反人道主义”，以法国本土理论范式（如结构主义）为中介，变成了许多左倾法国思想家当仁不让的权利。这个团体的成员包括雅克·拉克、米歇尔·福柯、让-弗朗西斯·利奥塔和雅克·德里达。

保守的革命框架从德国向法国的转移产生了一个左倾的海德格尔主义范式。因而，法国学院左派吸收了20世纪20年代期间德国右派对“理性”、“进步”和“主观性”毫不留情的批判。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相关政治失误（比如，法国共产党拒绝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声明），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开始急剧衰退。结果，对立的政治话语领地给了海德格尔“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可乘之机，为接受这种激进主义打开了大门。

作为不屈不挠的现代性批评家，同尼采一起，海德格尔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先驱。他的思想同后现代立场之间的意识形态呼应的是深刻的。晚期海德格尔把工作目标指向“形而上学理性”和“自我设置的主观性”的过度，两者都成了后现代主义者攻击自主性和进步的“元叙事”的靶子。不过，海德格尔的思想流露出了对“场所”（Heimat）、“起源”（“古希腊开端”）和“大在”充分在场（Nähe）的怀念，这些术语同后现代主义偏好的“缺场”、“裂缝”和“差延”遥相呼应。尽管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所有认同断言都是“压迫”和“排斥”形式，但是海德格尔一再地赞美同一性，尤其是德意志同一性，他把后者视为西方精神腐败的有益平衡力。后现代主义擅长于忽视其自身，尤其是像海德格尔那样的人物的思想遗产的折中方面。海德格尔，像他之前的极少数思想家一样，把盲目和洞见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二

理查德·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是20世纪最后25年最有影响的哲学著作。在该书中，罗蒂声称“客观知识”的目标——在一定水平上与世界实际存在方式相符合的哲学真理——是空想。罗蒂以治疗师和自由人自居，千方百计地想要把我们从2500年的漫长错觉即西方形而上学“语言游戏”中解放出来。罗蒂重申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完善的主张，断言所有知识都是局部的、受环境限制的。“普遍真理”观，独立于语境的真理断言，是哲学造就的神话的第一范本。

作为自我标榜的“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罗蒂认为，思想的基本任务在于享乐和审美，在于以日益有趣的方式重新描述现实，因此在于保持对话的活力。但是，通过揭露哲学传统认识论理性事业——无条件知识或绝对知识——的短处，罗蒂被人指责为相对主义者和思想轻浮者。^[5]

罗蒂坚持“反基础主义”，赞成大陆哲学的一些主张，在仍然致力于“确定性”议程的分析哲学家中间，这一举动被视为异端。在反认识论斗争中，罗蒂的主要盟友是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杜威和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对笛卡儿主义——例如把人明确定义为思维实体(res cogitans)——的批判对罗蒂议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打算为海德格尔写一部研究专著。这项计划的结果便是他的文集《论海德格尔及其他哲学家》(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

罗蒂对海德格尔的利用是公然断章取义的。他把海德格尔推崇为没有实体、没有前提假定的认识活动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强有力批评家。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把目标对准来自从笛卡儿经康德到胡塞尔的认识论基本传统的“先验主观性”断言。海德格尔主张：现代哲学非法地假定了科学认识活动。这种模式是充满错误的，从现象学上看是极其“原始的”(ursprünglich)。它在存在论意义上也是极其贫乏的。

“世界关系”、一般意义上的“世俗性”(worldliness)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相反,对同先验哲学的封闭单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此在而言,“在世之在”是第一位的。通过求助于此在,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提出了一种关系主观性模式。因此,先于作为“思维实体”的认识论身份,此在陷入了稠密的本体论的关系性的语境(Bewandtniszusammenhang)中:“与他者之在”,与被使用的对象之在(工具或 Zuhandenheit),陷入了“向死之在”中,陷入了它自身的“命运”(Schicksal)中。罗蒂发现,海德格尔以吻合于罗蒂本人实用主义、反基础主义议程的方式成功地将“第一哲学”的这些断言相对化了。

但是,对海德格尔如此断章取义的解读是充满危险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带来的主要问题是:“意识形态”维度和“本体论”维度是难舍难分地交织在一起的。^[6]只有经历千辛万苦才能把它们在分析意义上分离开来。像罗蒂这样心地善良的“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似乎对海德格尔主义令人难以容忍的意识形态的叫嚣充耳不闻。不过,假如我们翻到《存在与时间》第 74 段(只举一个例子),我们将会发现,海德格尔充分利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范畴:命运、文明社会、人民、代、挑选英雄。只有当一个人承认他正装做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他对思想家如此断章取义的解读才是合法的。罗蒂忽略了许多东西,以至于人们怀疑他提供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海德格尔”。

罗蒂不诚实地尝试在海德格尔的哲学和政治学之间划清界限。虽然存在主义哲学以同“日常”建立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曾经指出那样,以浸淫于“事实性”——为标榜,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是不足信的。^[7]假如“存在哲学”沉浸于“日常性”之中,那么他根据什么理由把政治排除在外呢?

在为纪念伽达默尔诞生 100 周年写的一篇过分的评论中(《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罗蒂遇到了涉及伽达默尔思想的相似解释的两难。罗蒂把伽达默尔系统地误读为他本人标榜的“后现代自由相对主义”的鼻祖。他对伽达默尔的著名格言“能被理解的就是语言”推崇备至,把它当做对自己的意图的支持:沉思语言防止了哲学去把握事物的

真实性质即“真理”。但是在他匆忙抛弃形而上学和“哲学实在论”最后遗产的过程中，罗蒂愚蠢地假装同一些思想家建立了同盟，而他们的立场破坏了他最推崇的自由主义美德：宽容的美德。伽达默尔的历史主义的确是一种相对主义，但是它很难为罗蒂拥护的自由社会价值赢得一席之地。相反，正是这种相对主义大张旗鼓地鼓吹“偏见”，沉浸于众所周知的和极有问题的“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之中。罗蒂因自己对解释学的虔诚而上当受骗，这说明了两件事：脱离语境做法的危险，对哲学文本纯粹内在的解读（按照那种解读，历史的“无用性”是先天注定的），以及他本人立场的概念弱点，就后者而言，对形而上学的恐惧最终变成了对理性和真理的绝对恐惧。^[8]

在后现代主义者中间，罗蒂偶尔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阵营之中。他狂热地认可他们的哲学议程（反基础主义），但是他又难以把自己同他们的政治观即“同一性政治”（identity politics）拉开距离。^[9]罗蒂公开哀叹在轻浮的后现代主义学术阵营里旧式社会民主议程的丧失。然而，最令人惊讶的事情也许当数罗蒂本人期望的天真性。在传统上，社会民主人士赞成有关进步和理性的“元叙事”。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看做西方哲学传统的合法继承人。在这里，像黑格尔主张的那样，理性不仅仅是“观念的”，而且是“现实的”。因此在历史上，进步人士很少是反基础主义者。此外，随着“政治”败坏为“文化政治”，那是后现代主义偏爱的“斗争”领域，物质生活领域及其附属问题便全都消失不见了。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尤其同现代语言协会趣味相投的精神状态。^[10]通过把自我设置的主观性理念作为有害观念来拒斥，其倡导者同时与解放主张划清了界限。反过来，他们公开赞美不利于人类自主性的零碎性和不连续性。把后现代主义同进步政治议程调和起来的尝试有点像把圆的说成是方的做法。我们痛苦地看到：出于溺爱，罗蒂一如既往地做着这项勉为其难的工作。

三

另一个最有影响的海德格尔哲学议程鼓吹者是已故的雅克·德里达。像罗蒂一样，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解读也是断章取义的。他把《存在与时间》的早期海德格尔当做过度“形而上学的”海德格尔来抛弃。按照德里达的观点，“此在”仍然残留着笛卡儿的“我思”因素。

德里达解读海德格尔的起点是1947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海德格尔在该文中提纲挈领地阐明了他的思想“转向”：从“此在”过渡到“大在”。虽然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断言此在是解答“大在问题”(Seinsfrage)必不可少的解释学钥匙。随后他把这个观点批评为严重的人类中心论。如他在《形而上学中的回忆》(1941)中宣称：“大在的历史既不是人和人性的历史，也不是人类与诸存在和大在的关系的历史。大在的历史是大在自身的历史，是唯一的大在的历史。”^[11]正是在这里海德格尔把对“理性的批判”(或者采用德里达的说法，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扩张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它变成了他转向之后哲学纲领的要害。于是，“大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转变为理性的遗忘、逻各斯的遗忘(Logosvergessenheit)。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海德格尔进一步声称：“理性，照耀了数个世纪的理性，几乎是思想最难以对付的对手。”^[12]虽然存在着各种难题，然而德里达义无反顾地表示拥护的正是“理性的批判”，正是“理性的批判”为解构主义者攻击西方“在场的形而上学”提供了理由。

尝试探讨德里达在北美的成功的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自相矛盾的论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德里达的名声在法国开始迅速衰退，讨论他的哲学的论文减到每年两三篇之时，解构主义却在美国登上了学术殿堂。对其著作的翻译工作、研究他的思想的学术会议以及尝试说明“所谓解构”晦涩性的没完没了的评论迅速增多起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欢迎这个巴黎理论先锋派的美国学术界——